

先秦两汉时期的五尺道研究^{*}

颜 信

【摘要】 五尺道为古代蜀道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古蜀腹地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重要交通线路之一,与牂牁道等古代西南夷地区道路相连接,成为古蜀腹地与域外的南亚、东南亚地区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五尺道沿线各种遗存遗迹和各类传世文献反映出,在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已经成为川—滇—黔各地间进行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先秦两汉;五尺道;道路走向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4)06-0023-5

先秦两汉时期,西南地区众多古道之中,五尺道是沟通西南夷各地最为重要的道路之一。笔者在文中将着重以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的形成、道路走向及道路沿线各地间的经贸文化交流为据,分析研究五尺道在整个西南夷地区道路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五尺道的形成时间

先秦两汉时期,西南夷地区因各地间存在着多条道路,各地间逐步形成了频繁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这些沟通各地的道路可以从古代记录西南地区的相关文献中获知。在西南夷地区众多道路中,“五尺道”则是一条被《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众多历史文献明确记载的一条西南夷古道。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载:“秦时常頔,略通五尺道。”^[1]另《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记载:“秦时常破,略通五尺道。”^[2]以上历史文献均载五尺道形成相关情况。五尺道的形成

时间从以上的记载看,应该为战国末年秦时开凿,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该条道路的一致认识。但是,近年来各学者在对五尺道相关的研究过程中,也对其开通形成的时间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看法,笔者在参阅各学者对道路开通形成的时间基础上,对这段道路的形成时间也有一点新的认识,愿与诸位学者探讨。

五尺道的开凿时间大多数学者以《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所考,认为是在战国末期,这种观点确符合历史文献之记载,但从近年来五尺道沿线的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各种器物分析,五尺道的形成时间很可能在更早的一个时期。上世纪90年代,在云南昭通营盘古墓群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批与古蜀文明相关的青铜器^[3]。另外,在贵州毕节的威宁县红营盘东周墓地、威宁中水遗址、威宁鸡公山遗址、威宁吴家大坪遗址等多个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其中多数的青铜器物中都包含古蜀文明的特征,较为典型的有蜀式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五尺道—牂牁道调查与研究”(编号SC12E038)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颜 信,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教,四川 成都 610068。

典型特征的青铜柳叶型剑^[4]。云南昭通境内和贵州威宁县的相关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与古蜀文明时期青铜器无论是在器型,还是在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上,都极为一致,其年代应该在公元前800年左右,这正是古蜀文明辉煌发展的一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贵州境内的中水遗址、云南昭通昭阳区洒渔营盘墓地等云贵遗址中,出土了与三星堆文化同时期(商周中晚期)的玉器。可见,在商周时期,古蜀与滇东北、黔西北地区间就已经存在着文化上的交流,这些地区间的交流必将有一定的传播途径才得以完成。而云南的昭通和贵州的威宁等地正是处于五尺道的主干线之上,那么古蜀与该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很可能就是借着这样一条道路而进行的,但就其道路的形成时间看,至迟也应该是在商周的晚期,很可能在更早的一个时期,五尺道已经形成且成为西南夷地区与古蜀国交流的重要路径之一。

另据段渝教授对《史记》中所载的“蜀故徼”分析研究指出,所谓的“蜀故徼”,即是西南夷诸族经由五尺道通往蜀地的途中所设置的关隘。蜀与西南夷早有直接商道可通,这就是“蜀故徼”。而这个“蜀故徼”,在秦王朝“略通五尺道”以前的商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5]。正是有蜀与西南夷诸族间设立的这样一些关隘,很好地保证了古蜀国与西南夷诸族间的交流,而五尺道正是滇东、黔西与当时的古蜀间交流最为便捷且畅通的道路,其年代也并非为史书上所载的秦王时期所开。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五尺道沿线的考古发掘遗址所出土的器物,还是从文献记载有关五尺道的情况看,五尺道形成的时间应该至迟不会晚于商代晚期。

二、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的走向

五尺道自形成以来,就已经成为川滇黔三地进行经贸文化交往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更是成为了西南夷地区间使用最为频繁的道路,同时也促进了西南夷各族间频繁的交往。笔者有幸实地对五尺道途径各地进行

了田野实地调查,因而结合古代文献及亲身走访,分析前人有关五尺道的走向研究,为此较好的梳理出了五尺道的具体走向情况,在下文中加以说明。

有关五尺道的走向,诸学者都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近人向达先生在其《蛮书校注》中考订指出,五尺道起自今川内宜宾,经高县、珙县、筠连,入云南之盐津、大关、彝良、昭通,再入贵州之赫章、威宁,最后过云南宣威达曲靖,全长两千多里^[6]。段渝教授指出五尺道走向为,从古代成都南下安南(今四川乐山),经夔道(今四川宜宾)、夜郎西境(今贵州威宁、云南昭通),直通南中之建宁(今云南曲靖)^[7]。而其他大部分学者对五尺道的走向大致认识都较为一致,并无太多的异议。

笔者经过实地走访调查,对五尺道的走向基本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五尺道应该北起川南地区的宜宾境内,北与从成都出发经乐山到宜宾的古道相接,在宜宾境内经过高县、珙县、筠连等地,再与云南昭通水富相接,经盐津至大关到昭通市昭阳区境内,在昭通市内向东折入贵州境内的威宁地区,在威宁境内南下接云南宣威经宣威入曲靖境内,这就是五尺道道路的大致走向。在入曲靖后,可以经由曲靖通联昆明的线路与其他线路相连接,通达境外的南亚或东南亚各地,可见五尺道正是古蜀国与当时西南夷地区,特别是其中的滇东和黔西交流的必经通道,也是古蜀国与西南地区乃至境外沟通的重要通道之一。

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在四川境内的道路主要集中在川南的宜宾,《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关五尺道的记述为:“秦时常頔,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犍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据书中索隐谓栈道广五尺。正义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隘,故道才广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另对夔之正义为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夔国^[8]。从以上文献记载集释可知夔临大江,其为古夔国,据考应为今四川宜宾境内,而现在宜宾境内还有众多夔

人悬棺存在于江河两岸,且有古道存留于宜宾高县、筠连等地。在宜宾境内现存有赵月古道、高县境内的石门古道、筠连—巡司段古道等古代道路存留,这些道路因长期使用几经损坏并被多次重修,但其道路现今仍有部分存留,在古道部分石板上仍清晰可见马匹长期踩踏而形成的马蹄印。宜宾境内古道从宜宾北部出发,南下经高县、珙县可达筠连并与云南昭通水富县或盐津县相互连接,而这也正是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在川滇两交接处的基本走向,正是故称宜宾境内的“犍道”。宜宾境内的五尺道为古代巴蜀所辖范围,因此相关文献有载秦略通五尺道。而这段古道在先秦两汉时期被不断修葺,反映出中央王朝希望通过该段道路加强对西南夷地区各部族的控制。

五尺道从四川宜宾南下接连云南境内的盐津和水富交界之地,因此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众多先秦两汉时期所留下的遗址,其中以云南昭通水富县张滩土坑墓的战国到汉代遗址为代表。在该土坑墓中发掘出众多随葬品,其中的青铜器制品尤为突出,在M1中的随葬品中有出土青铜柳叶型剑,M5中的随葬品中有2枚巴蜀图语^[9]。可见,在这一时期,古代巴蜀先民已经抵达该地区,水富县也正是五尺道主线上最为重要的节点之一,可以充分证明在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已经存在。云南境内五尺道从水富可抵盐津县,在盐津县境内的豆沙关附近仍然保留有较为完整的五尺道古道一段,古道上有一关隘称“石门关”。在古道旁有唐袁滋摩刻,内容为唐贞元十年(794年)出使云南所刻。时代虽为唐代,但题刻相关文字记录可以知道这段古道开凿已久,正是先秦两汉乃至后世蜀地通往云南的主要通道之一,这也正是五尺道豆沙关一段。五尺道昭通段一线经盐津境内进入昭通市昭阳区,这在之前记述关于昭阳区洒渔营盘墓地群发掘情况可知,古蜀文明在先秦时期已经影响这里,可见当时五尺道已经存在并较为顺畅,以

保证古蜀与云南昭通等地的交流。

五尺道在昭通境内折向东进入贵州境内的威宁县,在威宁县有部分古道遗存,如黑石头古道、威宁二塘乡境内古道等,这些古道正是从威宁境内南下入云南宣威的道路,其道路虽为残缺一段,但就其走向完全符合五尺道在贵州境内的走向。除威宁境内现存少量古道外,在古道沿线也有各种从商周至汉代各种考古遗址被发掘出来,如威宁红营盘东周墓地、威宁中水遗、鸡公山遗址、威宁吴家大坪遗址等多个遗址,这些遗址均位于我们所考察的五尺道主线周边,在这些遗址中均发现大量古蜀文明特征的器物,反映出当时古蜀文化已经涉及于此。笔者认为五尺道在先秦两汉时期已经存在且进入贵州威宁接连云南昭通、曲靖等地,这也正符合道路的基本走向。虽五尺道在贵州境内道路较短,但这段道路却可以与其他贵州境内道路相接连,如牂牁道等古道,可见古蜀文明与较晚时期的夜郎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交流与文化间的相互影响。

五尺道在贵州威宁南下折入云南的宣威,在云南宣威可渡现存一段古道,这段古道与贵州威宁二塘乡古道相接连,这较好的反映出五尺道经由贵州进入云南宣威的道路走向。经实地考察可见,云南宣威可渡古道向南与云南曲靖境内松林古道相接连,再向南进入云南曲靖沾益县九龙山,并与九龙山古道相接连。沾益境内的古道保存较为完整,全长约3公里,这段古道因处在九龙山上,故命名为九龙山古道,是五尺道进入云南曲靖城必经之道。将云南曲靖境内各段古道走向进行分析研究,笔者认为五尺道在云南曲靖境内走向是极为清晰的,正是从贵州威宁入云南宣威可渡再南下接曲靖境内的松林再经九龙山入曲靖城,这正可以将宣威可渡古驿道、曲靖松林古道和沾益县九龙山古驿道串连起来,此段道路即是云南曲靖境内的五尺道。

^[9] 犍道包括宜宾高县境内的石门古道、筠连县巡司古道以及赵月古道等,五尺道四川境内道路也正是“犍道”,可以说明五尺道经由四川宜宾进入云南水富和盐津县道路是完全符合相关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的结果。

综上,五尺道整段道路经由川滇黔三省,基本沿川南、滇东北、黔西北三省的交界处而建,道路同时可以与北端其他各段道路相接通达蜀国腹地,也可在贵州境内向东与牂牁道相通进入夜郎腹地并通达华南两广之地,南端可以经曲靖入昆明与大理等古道相连接,能通达南亚、东南亚等地。

三、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的地位和作用

先秦时期五尺道就已经初通,秦为进一步加强西南夷地区控制,注重对五尺道的开凿,确保道路通畅。秦灭汉兴后,汉代统治者希望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控制,深知五尺道的作用,加强对五尺道的管理。五尺道作为西南各民族间一条重要的通道,也帮助该地区各民族居民的交往,有利于各种西南地区文化(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的相互交融与发展,同时也促进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笔者试对五尺道在先秦两汉时期促进西南夷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在西南各地同时期道路中所处地位加以论述,揭示五尺道的地位和作用。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关五尺道的记述:“秦时常頔,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10]司马迁书中所载这段内容指出,秦时在五尺道沿线置吏,这说明中央王朝借此以加强五尺道的管理,也是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进一步控制。正如童恩正先生根据这段文字的推测:“既然秦在此置吏,当然就应当有商业往来”^[11]。童恩正先生的认识完全合乎情理,其实早在先秦时期,西南夷地区已经通过五尺道开展广泛的贸易。在汉代以后,五尺道成为蜀沟通西南夷地区商贸往来的最为主要的通道,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所载:“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12]从文中记载“蜀贾人窃出市夜郎”可以

知道,当时这种边贸间的活动主要以民间走私的性质存在,这种规模必定不一定很大,但是,可以充分说明蜀与西南夷及周边地区已经有着贸易往来。而蜀物枸酱流传于两广之地,是经由五尺道、牂牁道,即蜀中心腹地成都经乐山、宜宾、云南昭通入贵州威宁通夜郎腹地再转运两广之地。

如前文中所述,司马迁《史记》中有载“僰僮”,其“僰”应指僰人,居于当时川南宜宾及云南昭通等地。而“僰僮”则与牛、马等同视之,成为巴蜀商贾的商品进行买卖。另《华阳国志·蜀志》中僰道县条中有载:“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13]书中所指“僰童”也即《史记》中所说“僰僮”。僰道在今四川宜宾,正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张守节《正义》所指:“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司马贞《索隐》指:“服虔云‘旧京师有僰婢。’”从上文可知,“僰僮”在这里已经不再仅仅指僰人奴隶,而很可能是指的西南夷地区各族奴隶的泛称。虽“僰僮”为西南夷奴隶泛称,但以僰为名,说明当时僰人在汉代或汉代以前很可能成为京师奴婢。而“僰僮”入京师的路线很可能就是从僰道县(今四川宜宾)的僰道而入中原,那么僰道即为五尺道宜宾境内一段,可见五尺道在各西南夷民族相互联系和中央王朝对西南夷地区控制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五尺道沿线为西南夷各族所集中生活的地区,在这里生活着众多西南夷各部族,而据先秦两汉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西南夷居民多椎髻赤膊跣足。在近年来四川地区发掘的秦汉墓葬中,多有类似造型画像砖出土,如四川新都出土的“酿酒”画像砖,就有椎髻赤足推独轮车者的形象。另在成都市郊出土的“弋射牧获”画像砖上,持镰劳作者也是椎髻之民^[14]。除画像砖外,在四川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陶俑,也有西南夷椎髻赤膊跣足的奴隶形象^[15]。这些出土于秦汉墓葬中的画像砖和陶俑都反映出,秦汉时期,巴蜀地区有众多西南夷奴隶在此从事各种劳务之事,而这些在巴蜀地区劳作的奴隶中,肯定有来自于五尺道沿线

各西南夷部族之民,他们进入巴蜀之地必通过五尺道而来。笔者认为五尺道在这一时期对加强西南夷地区各部族间的往来,对加强西南地区与巴蜀地区间的民族交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帮助了西南夷各部族在农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的发展。

五尺道作为巴蜀地区沟通西南夷地区的重要交通贸易线,在先秦两汉时期乃至之后各朝各代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五尺道从先秦开始,其道路的性质及地位也不断发生变化,正如段渝教授在其有关五尺道相关文章中对该道路性质分析所指出:“在先秦时期,古蜀王国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

控制,则开通五尺道,利用五尺道加强与西南夷诸族间的交通贸易,且在五尺道沿线设置关卡收取关税,这可以说明,先秦五尺道是古蜀王国时期的官道。”^[16]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五尺道应形成于先秦时期,在秦汉时期进一步的被开发利用,乃至后世沿用数千年。五尺道在不断的开发利用之时,其性质也从单一官道之用逐步变为官商共用的性质。随着五尺道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它也成为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沟通西南夷最为重要的交通线之一,对繁荣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8] [10]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73.2993.
- [2] [12] 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73.3838,3839.
- [3] 王涵.云南昭通营盘古墓群发掘简报[R].云南文物,1995,(41).
- [4]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物管理所.贵州威宁县红营盘东周墓地[R].考古,2007,(2);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物管理所.贵州威宁县吴家大坪商周遗址[R].考古,2006,(8);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物管理所.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R].考古,2006,(8).
- [5] [7] [16] 段渝.五尺道的开通及其相关问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 [6] 樊绰著,向达校注.蛮书校注[M].中华书局,1962.27.
- [9] 云南省昭通市文物管理所,云南省水富县文化馆.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张滩土坑墓地试掘简报[R].四川文物,2010,(3).
- [11] 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J].文物,1983,(9).
- [13] 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75.
- [14] 闻宥集撰.四川汉代画像选集[M].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6.155.
- [15] 沈仲常,冯国定,周乐钦.四川汉代陶俑[M].朝花美术出版社,1963.9.

(责任编辑 邹一清)